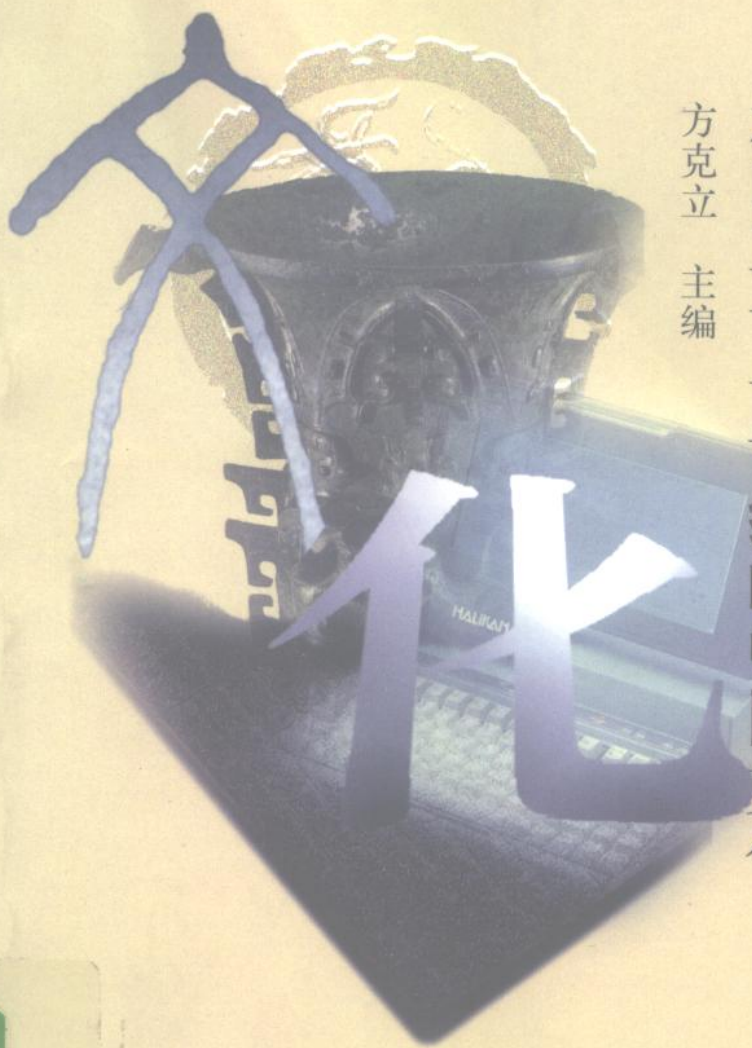


走向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文化

方克立 主编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GT122
47

方克立
主编

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

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版式设计 赵润英

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

方克立 主编

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8.375 字数:457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*

ISBN 7-5440-1415-0

G·1385 定价:23.50 元

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

(代序)

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，一直是古今中西问题，也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，以及中国文化（或东方文化）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。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有区别的，但是也有密切联系，在近现代文化讨论中二者难以截然分开。有一种“中西之分即古今之异”的观点，又把二者的密切联系视为等同，混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，显然也是不恰当的。

近代以来，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，各派观点纷纭繁杂，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。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：一是国粹主义，固执华夏文化优越论，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态度，有明显的保守、复古倾向；二是全盘西化论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，“尽弃自家无尽藏”，表现为民族虚无主义、文化投降主义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有各种各样的折衷调和派，折衷派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，就是他们都固执中西对立、体用二元思维方式，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，最后不是归于保守派，就是倒向西化派。完全排斥西学的国粹派的主张很难被现代中国人所接受，因此中体西用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形态。西体中用的主张，虽然有别于全盘西化论，但其实质是主张从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到上层建筑、意识形态，要全方位地西方化，只不过还要保留一点中

国的民族形式而已。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、带有折衷色彩的西化派观点。

与上述几种文化主张不同，近代以来，或者更远地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叶开始有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以来，就有一些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体意识，眼界又比较开阔，或者说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的中国人，主张在发扬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础上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，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。这种会通中西、综合创新的主张，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、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。历史已经证明，这种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，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，也优于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，因为它不仅已经超越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对立、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最正确的一种文化主张，也表现出了最健全的文化心态。可是很遗憾，我们对这种文化主张总结、研究、宣传得很不够。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，一提到全盘西化、彻底重建、儒学复兴、西体中用等论，可以说是尽人皆知，名声大得很，而很少人知道和称扬综合创新派；一说到“批判继承”，甚至被一些人看做是老生常谈，没有新意，“套语”而已。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。其实中国的老中青学者，多数都是赞成批判继承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点的；有的海外华裔学者提出了“批判的继承”、“创造的发展”、“创造的转化”等文化主张，实际上都是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影响，是在一定意义上认同这种正确的文化观点。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我们自己的原牌经典反而不受重视，这就是不正常。我认为有必要对综合创新派的文化理论进行比较深入的总结和研究，大力加以宣传，让这种正确的文化观深



入人心，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。

在这方面，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做了许多工作。他不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了“创造的综合”的主张，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，也反对全盘西化论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，而且在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，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需要，发表了许多文章、讲话和论著，大力阐扬综合创新之义，积极宣传这种正确的文化主张。张岱年先生是本世纪力主综合创新论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。

综合创新论是经过现代人总结和概括地表述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用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，批判继承，综合创新”四句话简要地表述这种文化观的基本内容。这就是我们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回答。显然，它与国粹派、全盘西化派、中体西用派、西体中用派的观点都不同，与这些偏颇的文化观点鲜明地对立了起来。但是，这种文化主张和文化态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，而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，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，曾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，并且积极地探索实践着的一个正确的文化方向。它已在历史的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，在理论上不断发展深化，发展到今天，理应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认识形态。

下面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：

早在 16 世纪末叶，徐光启就向明崇祯皇帝提出了“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”的主张。他认为首先要学习了解西方文化，会通中西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、胜过西方。近代以来，中国的有识之士中不断有人提出“天下之道其终也由异而同，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”（王韬）、“华梵圣哲之义谛，东西学人之所说”（章太炎）、“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”（杨昌济）等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主张。20 世纪初，孙中山、蔡元培等人



都是中西文化兼收并容论者，王国维还提出了中西二学“化合”之说，他们都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。经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，李大钊说：“平情论之，东西文明，互有短长，不宜妄为轩輊于其间。”恽代英说：“居于今日之世界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，以造吾国之新精神。”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辩证综合的文化观，在他关于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针的论述中，都强调“中国的和外国的，两边都要学好”。他认为在基本理论上“不应该分中西”，所以“中体西用论”和“全盘西化论”都是错误的。毛泽东提出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“全面的历史的方法”，叫做“古今中外法”。他说：“所谓‘古今’就是历史的发展，所谓‘中外’就是中国和外国，己方和彼方。”古今中外法“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，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”，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。毛泽东的老师、老教育家徐特立曾经通俗地讲解毛泽东的这一辩证法的文化观，他说：“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，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，现代的也要，外国的也要，中国的也要。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，和现代的结合起来；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，和中国的结合起来。”“古今中外法，把古今结合，中外结合，变成我的。像吃牛肉也好，吃狗肉也好，吃下去了，把它变成我的肉，这就对了，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。”这一解释，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法的辩证综合的本质。

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文化方针时，一贯强调对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，要采取批判继承、综合创新的态度。比如，1986年制定的《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

导方针的决议》，就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是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、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、立足本国而面向世界的，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”。处理好古今中外关系是这一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基本内容，也就是要处理好继承历史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关系，立足本国和面向世界的关系，古今结合，中外结合，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继承、吸收过来，变成我的，为我所用，综合创新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。这就是我们多年来探索实践所得出来的结论。

中国现当代文化学者，也多次论述过这种辩证综合的文化观。我在这里要提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提倡“新启蒙运动”的一批学者，其中有我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同志，还有一位张申府（崧年）先生，他就是张岱年先生的长兄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……（它）所创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，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，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。”在这段话中，综合创新的思路已经相当清晰。当时的新启蒙运动是支持毛泽东和鲁迅等人提出的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”方针的。

半个世纪后，以张岱年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，再次举起综合创新的文化旗帜，更加自觉地把它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联系起来，批评历史新时期的各种偏颇的文化主张，在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代表了一种最正确的文化方向。在张先生这个时期发表的大量论著中，有一本和他的学生程宜山合著的《中国文化和文化论争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），可以说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论述综合创新的文化学专著。



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章“我们的文化主张——综合创造论”，从理论上对辩证的综合创新之所以必要和可能，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阐述。在谈到辩证的综合创新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时，该书提到两点：一是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，二是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。这两点都强调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，而不只是提出某种可供套用的抽象公式。这些理论观点能不能成立，根据是不是充分，都还可以讨论，但是这些探索确实从理论上深化了对综合创新论的研究，对我们很有启发。这样的文化学理论专著，在我国不是太多了，而是太少了，难能的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，又结合中国国情，在理论上有所创造，确有新意。

最后，我再简单地概括一下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，它大致包含以下几个要点：

一、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，我们都要学习、借鉴、继承、吸收，这就是古代的也要，现代的也要，外国的也要，中国的也要。就学习、继承的对象来说，不是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，只要西方的，不要中国的；也不是像国粹派、儒学复兴论那样，只要中国古代的，只要儒学，固执华夏中心主义。我们学习、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，是全面的历史主义的态度。

二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，都是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，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。这就是以我为主，为我所用，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。继承、选择的目的是标准，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。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用、有利的就继承，无用、有害的就不继承。

三、学习、借鉴、继承、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的



方法，是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法，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继承法。不是原封不动地拿过来，吃了狗肉就变成了狗肉，而是要经过咀嚼、消化，经过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具体分析过程，吸收有益的营养，排泄无用的糟粕。在继承中有肯定，同时也包含批判、否定于其中。把握黑格尔所说的“扬弃”这个概念，就能了解“批判继承”的实质。

四、分析与综合相结合，综合与创新相结合。中国的也要，外国的也要，古代的也要，现代的也要，必须经过辩证的综合。辩证的分析与综合是统一的，把各种不同成分的东西吃进去，经过咀嚼、消化，都变成我的营养，这是一个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过程。文化系统的解构与重构，也是既有分析、分解又有综合。各种不同成分、要素的重新组合、有机合成，就创造出一个新东西。所以综合本身就是创造，就是创新。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，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，就可以改变自己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形态。例如中国的原始儒学，在吸收了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、道家思想之后，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，创造出了宋明的新儒学。可见，综合创新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。

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，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兴，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，是辩证综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创造性成果，所以，我认为，我们在今天应该高举“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，批判继承，综合创新”的文化旗帜，让它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目 录

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(代序)	方克立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

“天人合一”新解	季羨林(3)
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	干春松(20)
道的境界	蒙培元(37)
“尚通”: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	黄兴涛(53)
论“忠”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价值	白奚(66)
道学思想的社会学解释	郑杭生 陈劲松(80)
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结构的构架作用	沙莲香(103)
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	李学勤(121)
中国佛教之特点	方立天(135)

传统文化与现代化

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	罗国杰(173)
---	----------

DI96/17

论中国文化建设诸矛盾及其解决之道	周德丰(190)
论中国的“现代化”与“现代性”	金耀基(211)
中国: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	谢遐龄(227)
文化的比较与比较文化	滕守尧(248)
中西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人格观的演变	吴乃华(259)
孔子的社会哲学与社会系统的调整	刘文英(282)
庄子的人格理论与现代中国人格建构	李道湘(302)
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考察	许全兴(317)
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命运	王南湜(332)

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

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	衣俊卿(351)
漂泊的心灵: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价值失范现象	
.....	何显明 揭扬(367)
文化理念与文化难题的突破	樊浩(378)
当代中国学人思维方式之检讨	俞吾金(393)
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	姜义华(402)
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述	何晓明(419)
要注意研究 90 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..	方克立(451)

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

面向 21 世纪的华人文化	戴逸(473)
论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	王树人(478)

鲁迅的中西文化观	李文海(495)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新秩序	俞正梁(513)
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:对主权观念的挑战	王沪宁(523)
评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	汤一介(541)
墨家学说与人和自然和平的重建	张斌峰 张晓芒(551)
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	张岱年 王东(564)

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

“天人合一”新解

◆季美林

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。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，哪一个也回避不开。但是对这个命题的理解、解释和阐述，却相当分歧。学者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，理解的角度，也不尽相同。这是很自然的，几乎没有哪一个哲学史上的命题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。

我在下面先简略地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，然后介绍一下几个有影响的学者对这个命题的解释，最后提出我自己的看法，也可以说是“新解”吧。对于哲学，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，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，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。但是，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是非常奇怪的，真正的内行“司空见惯浑无事”，对一些最常谈的问题习以为常，熟视无睹，而外行人则怀着一种难免幼稚但却淳朴无所蔽的新鲜的感觉，看出一些门道来。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很容易解释，在人类生活和科学研究中，并不稀见。我希望，我就是这样的外行人。

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和含义。

什么叫“天人合一”呢？“人”，容易解释，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。“天”却有点困难，因为“天”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。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笔下，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

一个有意志的上帝。这一点非常稀见。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，与地相对。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。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，我把“天”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。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，离开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。这对说明问题也比较方便。中国古代许多大哲学家，使用“天”这个字，自己往往也有矛盾，甚至前后抵触。这一点学哲学史的人恐怕都是知道的，用不着细说。

谈到“天人合一”这个命题的来源，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。《中华思想大辞典》说：“主张‘天人合一’，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。”这是很有见地的话，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来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，意思就是，不限于思孟，也不限于儒家。我先补充上一句：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、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。

为了方便起见，我还是先从儒家思想介绍起。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说：“‘大人’者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吉凶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这里讲的就是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，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。

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点矛盾，他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，天不言而四时行，而万物生。他时而又认为，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。他不把天视作有意志的人格神。

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，可以《中庸》为代表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

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。《孟子·万章

